

「高陶事件」主角亲述
封藏六十多年首次出版

高宗武回忆录



高宗武著
陶恒生译



高宗武回忆录

高宗武 著
陶恒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宗武回忆录 / 高宗武著 . — 2 版 .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00-9802-7

I. ①高… II. ①高… III. ①高宗武 (1906 ~ 1994) — 回忆录 IV.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7568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郭银星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969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2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802-7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高宗武 1906 年生，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1931 年毕业后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教授政治学。次年转任《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兼中国政治学校教授。1933 年转入外交领域，先后担任亚洲司科长、副司长、司长，从事对日外交工作。

抗战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的指派，辞去外交部职务，在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掩护，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是在这段时间，他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和平运动”从事秘密外交活动，并追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发生后，外界一直希望从高宗武口中，了解到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真相，虽只言片语，亦必弥足珍贵。但是他始终守口如瓶，对当时的经历避而不谈。这本《高宗武回忆录》是他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 1944 年 8 月完成的英文手稿。但是书稿完成后，他很快放弃了出版意愿，以致许多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不知道有这部书稿存在。直到 2005 年 6 月底，这本回忆录的手稿才被意外发现，由陶恒生先生译成中文，并对相关史实做了详细的考订和注释。

这部回忆录共有 15 章，记述了他 1931 年回国后，从事对日外交的经历，中间包括他加入汪精卫集团，从事“和平运动”的部分。经陶恒生先生授权，我们现将这部书稿收入《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正式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内容，掌握历史的真相，我们将范泓先生的《从政七年如咯血》一文作为本书的代序，并将一部分相关史料，作为本书的附录。本书对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毕竟时过 60 多年，读者当以今天的历史高度正确对待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陶恒生先生的大力帮助。他不但提供了全部译稿，对出版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也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代序

从政七年如咯血

——高宗武旧事

范泓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道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怀抱；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我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我们。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山、英雄失路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若复隔世，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当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寿者，我们不去谈他们。

(一)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五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

的年轻人^①。返国后，在首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日本大学的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课程的内容，这是我在写作《雷震传》时所了解到的。1991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是何种学历。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的“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②。也就是说，归国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海军大尉塚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当时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政治领袖、有力财团，从而来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当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入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来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150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

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同时答应再介绍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另有150元。日本首相犬养毅意外之死，打乱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计划，也改变其一生的命运。就这样，高宗武没再去广州，成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一时间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蒋介石却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高宗武有一好友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其入侍从室工作。蒋介石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为他处理对日问题。不知后来为什么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这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便自兼外交部长。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脱离《中央日报》社，转到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人的命运有时不可逆料，高宗武虽然婉拒蒋介石，未敢去侍从室做那个上校秘书，汪精卫却又找上门来：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③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于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此时若能进外交部，发挥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不啻于是一个“天赐良机”。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初，他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时高的薪俸每月300元，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300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勉强可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开始时无法进入。后在警察特高课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且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得到蒋的一次召见。

蒋对高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他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或可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应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职责，给予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膺白）在北平奉命处理华北地区有关中日交涉事宜，黄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

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通商、通邮等各项问题，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原则之下，专谈通邮上之技术问题”。黄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郛，发现并非是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按：高未刊回忆录，尘封六十一年之久，2005年6月在美国被发现。详见后文。本文为首次引用，以下不另加注）黄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高到华北后，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在给友人信中，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颇有同感，驰电蒋介石拟邀其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又是婉拒。蒋又因此而特别欣赏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为官的态度。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

年纪那样轻就当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④。高本人却这样说：“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赴欧洲疗伤；蒋介石乃接手为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驛马未动，仍为亚洲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由高宗武一人负责，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蒋也会直接来找高宗武。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

以上这个细节为高宗武晚年对好友周谷所说。

翻检陈香梅《张群先生话往事》一书，未能得到证实。但周的文章公开见诸报端，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从有关史料看，高与顶头上司张群的私交确实不错。张做了一年两个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长，以他自己的话：“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⑤张后来对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难以对付，且须事事请示蒋介石，无以独当一面，高建议他辞职。“张遂于1937年2月25日迳电蒋委员长请辞，久未接复电，一日突接蒋电‘嘱高宗武来见’。张部长很幽默地对高司长说：‘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3月3日张群辞职照准，却由王宠惠继任”^⑥。周谷不知何许人，竟用了一个“却”字，给人的印象就好像蒋曾属意由高来接任外长，其实不过是纯粹的臆想而已。且不说蒋在

用人上向素隐忍多谋，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权力上的制衡，凭此时高宗武在政坛上的实力，何以能出长一个关乎国家之命运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后来在汪精卫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轻”，最多只能当外交部次长。所以，张群的一句玩笑话，岂又能当真呢？不过，张群任外长，却给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他甫任后，即“一改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日方谈判的战略，以求中日关系的全盘调整”^⑦，这一思路与高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的卖力就可想而知。从张群的回忆中可证实当时对日交涉时高均有参与，有一次派他会同张嘉璈、王世杰专程飞广州，向蒋汇报有关会谈详情，并请求指示^⑧，可见高在蒋、张二人面前的某种重要性。不过，高本人心里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中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首脑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员……”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对部长只称“岳军先生”（即张群），对蒋介石、汪精卫均称蒋先生、汪先生。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以致不久即闯下大祸。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表明中国已不可能再忍让。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气概，又为日

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⑨战争初期，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过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这一连串的外交行为，是在兑现七、八天前，蒋在庐山同时又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愿望，即以时间争取空间，从而赢得战机。蒋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⑩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而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曾经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后者的腹稿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这就是拟议的‘船津工作’”。^⑪日本人之选中高宗武为试探对手，可见这是一个能将求谈

信息迅速带到南京上峰那里的人。刚刚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国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实上已成为中日双方此时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表明责任与分量不会太轻。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有过记载：

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 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⑩

蒋、汪二人与高宗武谈了些什么，自然不允外界所知。高或许只对胡适先生一人说过，但胡适在日记中却只字未提。但随后从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动或可表明，显然是在受命寻找与日谈判的可行途径，只见他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这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已是王宠惠，他对高宗武的动向似亦不甚清楚。

高在王部长任内，奉蒋委员长密令前往上海办理对日交涉，即向王部长说拟往上海一行，王不同意，高说：“委座知道。”王是老官场，立即说：“那你就去罢。”高到上海后，绝口不提奉何人命前来上海交涉，谣言甚多，引起政府疑惧。外交部对高亦不满意。高每周单独往见蒋委员长一、二次，每次谈话都是很长。

这在当时已是异数。高说蒋委员长对日交涉要做到“不卑不亢”，蒋的内心极为痛苦。¹³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却不容忽视。“1930年间，日本已被陆军中激进少壮派及右翼团体包围威胁，凡举主张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坚持稳健保守之理财者、约束军纪之将领均经先后被刺杀，其压力及于文化界教育界及实业家，舆论亦只能支持急进政策，所以也缺乏转圜余地”。¹⁴日本军人甚至扬言“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使战争越发激烈，即使双方其中有人试图寻求停战的可能性亦日渐渺茫。五个月后，南京弃守，《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碰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后者对张称：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国。张立即将这位大使的话口头转告蒋介石，“给蒋印象至深”。大约过后五年，蒋仍耿耿于怀，日记中犹提及此语：“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彼语季鸾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其意此时若放松中国就不能救日本。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身莫忘，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决不能求生存，其愚至昧至此……”¹⁵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秘密会晤。当晚返回南京，将会谈内容直接向上峰汇报。就在这天晚上，上海却发生了“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保安队所击毙，从而引发了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船津工作”因此而流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日本陆军“不扩大派”与“扩大派”内斗的一个结果。接下来的故事，是高辞去外交部任职，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殊不知此去，竟一意孤行，越走越远。

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此时矛盾更显突出。

随着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其日本人之游说，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关系；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仅仅过了一个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突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决定放弃与中国的谈判。日本人的这一强硬态度，进一步刺激了汪精卫求和的心情，其抗战的调门越来越低。这一年2月，高宗武到达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在办理商务，暗中操纵“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的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况的工作”^⑥，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据周佛海日记，每月两千美元）。“艺文研究会”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并不公开。周佛海为事务总干事，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兼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原北大教授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有人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的一个机构，其实“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陶主持”，^⑦最初设在汉口英租界内，后迁至重庆。2月中旬，高宗武即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苏日关系）董道宁秘密赴日本，其任务是“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真实态度”。^⑧董带回一封日本参谋部影佐祯昭给昔日同学何应钦、张群的诱和密函。4月初，高与董回汉口，将密函交周佛海、汪精卫阅。次日，高谒蒋介石，又将影佐密函交蒋。蒋嘱咐高不要将此事告诉影佐。14日，蒋指示高再飞香港。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⑨高开始了新一

轮的秘密使命。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卷中《高宗武致蒋委员长函》可证实，这一年4月16日，高将有关和平条件通报给了日方：西义显返日，“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见”。不久，徐州会战打响，日方对高通报的和平条件未予答复，此事被搁置下来。5月底，高回过汉口。从周佛海日记中可知，高与之有过两个小时的密谈。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汪精卫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公开表明他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分歧；进而武汉失守，汪夫人陈璧君竟又指使艺文会香港分会，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作“和平谈判”接触，与日方签下导致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的若干文件，其主要谈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当时陈璧君往返于香港与重庆之间，她对高、梅二人说：“你们是为蒋先生跑的，现在试为汪先生跑跑。”^②陶希圣之三子陶恒生先生在其专著《“高陶事件”始末》中对此慨叹不已：由蒋介石面命组成，从事对日抗战宣传的“艺文研究会”，其香港分会及下属机构，“到这时竟成了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蒋介石佯装不知，还是真被蒙在鼓里？

应当说，1938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蒋介石是知道的。

尽管蒋一度改口让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后在周佛海的担保之下，高还是去了。蒋对高确实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太年轻，与日本人又如此过从甚密，若稍有差池，则必误国家之大事。高则这样回忆：“战争爆发后，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汉口。跟日本人的谈判结束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连串的‘事